

2011 年度浙江省社会学年会综述

俞 昼

【摘要】2011 年浙江省社会学年会在杭州市委党校隆重召开。会上进行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立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建设文化强国与维护文化安全”等三场主题报告。同时，会议还就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 城乡统筹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浙江可持续发展研究； 地方性知识与浙江发展特色、经验、问题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探讨。

【关键词】浙江；社会学；年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12)01 — 0092 — 05

2011 年 11 月 12 — 13 日，由杭州市社会科学院、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联合承办的浙江省社会学学会 2011 年年会在杭州市委党校隆重召开。中国社会学学会学术顾问谷迎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辛薇、中共杭州市委副校长朱金忠出席。本次年会以“地方性知识与浙江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试图在学理层面系统总结、提炼在浙江社会高速发展与现代化实践中，具有中国地方性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同时进一步展望和分析浙江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与应对之道，以丰富和阐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会上进行了三场主题报告：赖金良教授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立场”、董明教授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陈立旭教授的“建设文化强国与维护文化安全”。参会论文中的八位作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并由秦均平教授、任映红教授、马良教授和方巍教授分别对其论文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会议综述如下：

一、关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浙江大学赖金良教授发表了题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立场”的学术报告，指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具有科学的立场、社会的立场、历史的立场和公意的立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立场就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点上去观察与思考所遇到的问题。科学的立场要求我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不能仅仅重复前人的研究，而是必须带来知识增量； 社会的立场要求我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必须系统地审视社会的结构化特点，厘清科学的研究的因果关系； 历史的立场要求我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必须具有历史的依托，站在历史的长河里探讨现实的社会问题； 公意的立场要求我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唯事实是从。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董明教授发表了题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学术报告，指出：民主是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博弈的均衡状态，民主不是被赐予的，并且始终处于动态之中； 社会权益的得来，从来都是社会力量、民间力量抗争的结果； 社会管理的真正精义在于形成政府管理与民间自治力量之间的互动互补，绝不能以打击社会自主性的方式来建设社会； 良序社会的形成需要的是水滴石穿式缓慢地点滴累积与成长，得之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现代性再造之功。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陈立旭教授发表了题为“建设文化强国、维护文化安全”的学术报告，指出：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是经济实力，软实力是文化实力； 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在硬实力上已经位列世界强国之一； 然而在软实力上，我国的文化影响力还远远不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产业化能力，没有强有力的文化产业就相当于失去了向世界传播自己声音的话筒。因此，正如十七届六中全会所强调，需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者简介:俞昼，浙江省社会学学会兼职秘书，浙江师范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邮编: 321004

二、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宏观上讲，社会管理的职责所在，就是协调公民自由权利之间的关系，看护公民自由权利的边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教授认为，社会学公理在于，社会秩序是由合法性支撑的，这种合法性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追求的根本目标，也就是社会管理的轴心。从这一角度而言，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也就自然成了社会管理的中轴结构和原理。从社会权利中轴原理出发，社会管理也就是以实现和维护社会权利为根本目标，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以此调整和增进社会福利，提升社会质量，推动个人发展和社会有序和谐的过程。围绕这一权利中轴，社会管理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主要内容：保障民权（增进能力的权利、获得平等的权利、社会参与的权利）、改善民生（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保障合法权益）、维护民安（强化社会秩序管理、着力打造法治社会）。

温州大学任映红教授认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确立公平正义、依法行政、公共治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才能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必须遵循服务原则、法治原则、市场原则和公开原则，以增加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确定以后，正确选择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包括：健全社会管理机构，加快社会管理法制建设；健全协调利益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馈渠道；创新社会服务体制，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坚持社会管理的群众路线；创新社会管理手段，建立社会管理绩效评估体系，以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社会管理是国家改变现有社会秩序的积极尝试，丽水学院彭兵认为，从发达国家社区发展的提出和实践来看，社区发展被国家积极应用于提高对居民的经济支持和服务供给，增强居民对社会集体生活的信心，为塑造居民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创造条件。作为小型聚居共同体，社区是发展居民之间相互合作、发起并组织集体行动的重要单位。面对以市场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和以国家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社区发展被当做既尊重个人权利又倡导社会团结与归属的中间道路。在多方推动下，社区发展逐步演化为广泛的社会建设运动。在此过程中，国家和社会逐步弥合分歧、重建共识，即国家摆脱了直接经营和管理社会的负担，社会也通过倡导公民的社会责任，唤起居民对社会团结与集体生活的期待与渴望。

“网络暴力”是当前政府在加强社会管理工作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一个崭新重要课题，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姜方炳认为，网络暴力是中国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必然产物，是网络技术固有的风险特性和不断积聚的转型社会风险经由网民交互行为而发生共振、扩散的结果，它主要涉及网络技术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及网民群体结构三个风险源：网络技术的风险特性是催生网络暴力的潜在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的无序释放是催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动因；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结构特点和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是催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建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以减少各类风险发生交叠、共振的频率。

同样是研究不道德网络行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黄少华教授通过对 1157 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的不道德网络行为（网络侵害、网络滥用、网络盗版、网络抄袭）在大学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尤其以网络抄袭最为严重。与此同时，调查还发现，大学生是否在网络行为中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主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一行为的道德评价，以及来自同侪的道德压力和道德评价。因此，要预防和控制大学生的不道德网络行为，首先要对大学生群体的网络行为进行有效社会管理，加强网络道德素养培育；其次还要切实改善网络道德培育的社会氛围，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环境。

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由于邪教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做好反邪教工作。中共杭州市委党校高磊分析了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对反邪教工作的要求，即要注重和谐、建立机制、以人为本、加强教育，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反邪教工作的建议：完善机制建设，构建防范邪教的管理体系；加大查控力度，挤压邪教组织的活动空间；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教育转化工作的社会效益。

三、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近年来，一些国家重新定位政府与社区的角色关系，把“社区”视为治理公共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载体。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方秀云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已进行多年，然而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下，仍与社会发展变迁的现实要求相距甚远：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弱化、社区居民参与率低、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依据我国国情和城市社会现状，现代城市社区已成为推动市民社会建设多方行动的活动场所，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国家用以贯彻实施决策方针、实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整合的基本单位和重要手段，是一个政府、居民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共同行动，即社区居民的自助精神、自觉行动与社会参与、政府推动的合作过程。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平台，是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中共杭州市委党校陈宇以杭州地区的农村行政村（社区）为基础，围绕杭州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状况、服务设施的使用状况、服务制度的建立与运行状况、百姓的服务需求以及服务的后续保障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认为在我国农村社区服务的建设问题上，我们应该：提高统筹层次，构建国家责任，实现社会公平； 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 确立以农民的需求为主导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 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评价体系。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郎晓波力图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公共领域的再建构问题。由于原先的公共经济基础和经济控制权的保留，“村改居”社区有着与城市社区不一样的开展自治及公共治理的基础。具体而言，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村改居”社区独特的内部利益载体，以相对封闭和排他的形式保护并改善着社区内所有合法成员的公共利益，为其成员在参与社区建设过程中提供了有限度的公共讨论空间，并逐步构成了“公共意见”的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分层与分化，部分普通工人、农民以及未能享受政策带来的财富的人依然贫穷，而他们的子女由于基础环境差、得到教育少仍然未能摆脱贫穷。浙江工业大学祝建华通过对全国 6 个城市的低保家庭、退休家庭以及常态家庭的基本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了城市低保家庭贫困的主要特征以及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城市低保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于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领域，呈现出立体性贫困的特征；城市低保家庭的经济困难现状，导致了其在学龄期儿童素质教育上投入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成年后的职业产生影响； 因病致贫是城市低保家庭的典型特征，家庭供养条件不足使得城市低保家庭的子女身体健康状况在后期竞争中处于弱势； 在城市低保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家庭互助功能不容忽视，社区因素的影响举足轻重；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低保家庭反绝对贫困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其基础性地位值得重视，但政策效果与功能有限。初步的调查数据分析说明，在寻求缓解城市低保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措施上，要充分重视政府的主导地位，通过面向家庭、需要满足与权利保障、政府主导、可持续发展、基础综合与专项救助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政策干预以达到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目标。

生殖健康权利是人权的基础，生殖健康权利的促进，流动人口权利的生产是一项长期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浙江工商大学高燕通过在浙江省 4 市 8 街道 10 社区共 600 户居民的多阶段分层抽样调查，发现影响流动人口生殖健康需求程度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居住类型、治疗费用、就医时间、就医地点 6 个变量，得出针对流动人口特征，必须开展生殖健康权利意识的教育与促进工作的结论。调查还发现，女性、受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居住集体宿舍或临时工棚、自费诊疗病人、患病后思想麻痹不主动就医、选择到社区计划生育中心就诊的流动人口是服务的重点人群。

四、关于浙江可持续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为浙江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力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源泉。但随着老龄化的开始，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如何创造浙江新的“人口红利”是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李中英综合发达国家在转型中挖掘人口红利的做法，认为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包括：把握机会窗口“延续”现有人口红利； 加

大制度创新充分“释放”潜在人口红利；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推动“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积极应对老龄化探索“老年人口红利”。

浙江因地缘生态而生，也由地缘生态而兴。离开生态资源，浙江的生存与发展就无从谈起。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浙江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林宏、岳凌云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时间序列模型等研究工具，对“十二五”期间浙江资源环境压力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增强水资源保障能力、打造浙江特色能源体系、开展全领域生态规划设计、加强支柱产业专项整治和调整等若干对策建议。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三赢”经济，它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与进步有机地统一起来。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有利于城市的生态化建设，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葛彩虹从循环经济的视角，提出杭州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建立政府主导的生态城市规划；构筑农业、工业、旅游业等循环经济产业结构体系；加强循环型工业园区和农业生态园区建设。

随着浙江各项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综合发展，浙商群体成为了集中反映浙江速度、浙江现象、浙江精神的一个重要缩影，“天下浙商”以及企业精神作为浙江人民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伟大体现，极大地丰富着我国创业创新、科学发展的实践主体和实践成果。浙江外国语学院周明宝从商业资本集聚时期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积累和扩张企业资本）引申出转型发展时期的“新四千”精神（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表明浙商精神在金融危机的磨砺中愈加成熟，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浙江企业精神面临着如何依靠新一代浙商进一步优化和传承的问题，对青少年一代着力开展“企业家精神”教育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 30 年，温州以时间压缩的形式经历着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空间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过于快速的变化，使文化精神领域和社会心理很难跟上其步伐。温州市瓯江新区管委会胡晓慧从文化自觉出发，深入研究温州转型现象，从温州人文化观念、社会转型期的市民心态等方面来探讨转型期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以温州特色地域文化为基调，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精华的价值引导与评价体系，尤其是要注重四个方面的转变：实现从熟人信用向现代契约精神转变；实现从小团体意识向现代公共精神转变；实现从“品牌”意识向大爱精神转变；实现从急功近利向追求卓越和合作共赢转变。

五、关于地方性知识与浙江发展特色、经验、问题研究

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不仅指特定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与方法论；“地方性”不仅指特定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它还涉及特定的属性，包含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所形成的立场、观念和价值观等。浙江各地正是借用“地方性知识”来丰富与创新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浙江基层民主发展，结合了地方性的特色，在实践中创新与突破，创造了多种富有特色的治理文本，不仅提升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创造能力，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基层民主治理的形态。中共杭州市委党校黄丽萍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审视当代浙江基层民主的本土资源的累积与创造性转化，并对浙江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创新给予解释与探索。

2010 年浙江省流动人口达到 2006 万人，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叶菊英从“十一五”以来，浙江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经验出发，提出了浙江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存在的六大矛盾：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巨大需求与现居地承载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与现行管理体制多种模式并存的矛盾；管理部门对加快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综合信息平台的迫切需求与浙江省流动人口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流动人口对子女教育的公平性需求向公平与质量并重需求的转变与现行教育制度下难以充分满足之间的矛盾；社会保障政策的基本全覆盖与流动人口实际参保率较低之间的矛盾；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并由此提出了六大对策建议：积极稳妥地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加快建设统一的流动人口综合信息

服务平台； 深化公共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公共教育均等化； 完善社会保障的政策设计，提高流动人口参保率； 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就今天我国的现状来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真正要义，不仅在于承担着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各级政府部门应首先切实履行好为民众提供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基本公共物品的基本职能，并且，还需顺应现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为社会和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留下足够的空间，鼓励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董明教授以义乌民间力量（以商人群体为主体）与政府之间正逐步形成的相对较协调的力量格局为基本事实依据，分析义乌地方政府面对常态化的民间力量的成长，通过释放空间与自身职能转型并举的途径，以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实现必要的互动互补，来阐述一个道理，即只有国家与社会两种权力结构得到均衡配置的社会才可望实现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在中国，由于传统的孝道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家庭养老的坚实基础，居家养老模式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战略选择。民间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是一种具有多层级特征的间接委托代理模式。针对各地普遍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华中农业大学张超、吴春梅教授以杭州市近年来探索形成的“以老年人需求为本、政府主导、社区协助、民间组织具体运作”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为基础，探索该模式在地方政府职能角色定位、老年人权利强化、民间组织功能激发等方面的创新之处，并提出优化民间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尚需进一步采取强化对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激励和向老年人增权等措施。

乡镇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是国家管理农村事务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重要载体。乡镇治理是国家管理职能在农村社会的缩影，其功能发挥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乡镇治理面临着是扩大商机权力的基础、还是防止村治权力进入的两难选择。中共台州市委党校林兴初通过对2005—2009年的温岭“泽国实验”的具体剖析，发现了乡镇政府如何在“国家—乡镇政府—农村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并认为这一实验在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机制创新，科学设计了“协商民主”的程序，有效引导了农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使乡镇治理更加符合时代形势的变化，实现了农村地区的治理创新。

农村是我国社会的基础，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大基础性工程，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关键又在于农村社区治理。农村社区治理是指建立在社区区域规模适度基础上的，以健全和完善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为核心，党委、政府、自治组织、民间组织、企事业单位乃至个人共同参与管理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共绍兴市委党校卢芳霞以绍兴县枫桥镇为例，总结出“党委发挥总揽全局和统领各方的作用，政府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社会各界密切配合和协同管理，居民积极依法理性和有序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枫桥经验”，为全省各地农村社区提供借鉴。

目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出稳步发展的势头，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业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看待和处理他们的城市融合问题，使他们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确保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融合的艰巨任务。城市社会融合程度关系到城市社会结构的动态稳定，关系到城市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实，关系到城市社会人际关系的融洽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共余姚市委党校陆银辉通过对余姚市新老居民和谐联谊会的考察，探讨了融合性组织在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合中的作用：加快经济层面的融合； 提高生活层面的融合； 促进心理层面的融合； 增进文化层面的融合。

除了上述话题外，与会人员还就农村教育问题、慈善类社会组织研究、社会建设思想以及灾害预防等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